

我的初中班主任

■吴建昌

我们成长的旅途上,定会有许多老师陪着我们走过那一程又一程。那一程中,你还会记着他们的点点滴滴吗?——题记

我的初中是在附设初中班读的。附设初中班所在的学校名叫“解放小学”,其真名叫“塘北桥小学”,学校坐落在现干窑镇南亩村,当时是由南亩、江泾和新民三个大队合办的。塘北桥小学早已在本世纪初的“撤点并校”中被撤掉了,老校舍也几经改建,先为南亩村的村部所在地,现又改建为集农家乐、民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南亩渔村”了。

那附设初中班的学习生活虽已是遥远的过去了,但附设初中班三年的班主任及他们的点滴往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初一年级的班主任姓谢。谢老师是南亩村的民办教师,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他是当时县“五七学校”“红师班”的第一批学员,“红师班”培训结业后当了民办教师。他起先教我们语文。上世纪70年代初,语文课基本上以学习“语录”为主、学习语文知识为辅。所以学得比较简单,大致上是一些拼音、词语及语法中较为基础的东西,譬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还有就是学写批判文章、背“老三篇”与“语录”,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需。谢老师除了教我们语文外,还教体育课。谢老师教体育课跟教语文一样敬业,他上课时浑身充满活力。他有一句口头禅:“做什么都要有良好的身体!”上体育课时先带领我们在泥操场上跑步,再做广播体操。他的示范动作做得相当标准,要求学生也做到一丝不苟。我至今仍记得他教我们怎样打排球,谢老师是在“红师班”学会打排球的,而我是在初中时学会打排球的。记得有一回,省教育部门的领导在县教育局领导的陪同下,到附设初中班调查研究,还听了一些老师的课,谢老师就是被听课的老师之一,后来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来听课的领导对谢老师的课非常认可。可惜谢老师只教了我们大半年,后来他担任大队领导

去了,再也没有回到三尺讲台。如今谢老师含饴弄孙,种种菜,栽栽果,养养鱼,身子健健康康,日子快快乐乐。近几年的暮春初夏,谢老师总会开着电动三轮车到县城中山路人民桥头卖他自己培育的各种蔬菜秧苗,譬如番茄苗啊、辣椒苗啊、茄子苗啊……我时不时到他卖秧苗的地方,跟他聊聊天说说话。巧的是,我是谢老师的学生,而谢老师的女儿是我的学生。

读初二时,班主任姓金,是一位30多岁的女老师,接手我们的语文课。金老师是共产党员,她是公办老师,还是学校的负责人。金老师虽教我们语文,但听说她初中数学、物理、音乐、美术这些课也都能代上。我读书的时候,听过她弹的风琴曲子(那时村小有脚踏风琴已算很不错了,当时我所在村的小学校里没有风琴,只有胡老师有一把二胡,直到后来才添了脚踏风琴),真的很好听。这样一位老师来教我们语文课,同学们都感到很高兴,所以听课也就格外认真。初二的语文课开始学点语文的内容了,也开始学文言文了,当然“语录”还是要背的,那时起,我有点喜欢语文了,也开始有点语文基础了,特别是背诵方面。我在初二时加入了共青团,入团介绍人就是金老师。记得当时金老师一家住在镇上“书场”门厅的楼上,这个书场的房子现在还在,没有被拆掉。初二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公社学生田径运动会,因为我们几个参加运动会的同学家住得离运动会举办地干窑中学很远,为了便于我们参加田径项目的比赛,金老师就叫参加比赛的几个男同学住在他们家。记得我在那届运动会上夺得了初中男子100米短跑及跳高双冠军,算是为附设初中班争了光。

初二即将结束时,上面来了文件,说初中学制要改,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从我们这届开始,这样我们很幸运地有了读初三的机会。初三又换了一位班主任,姓吴。吴老师当时也是民办教师,干窑镇黎明村人,是老三届高中生,络腮胡子,香烟从不离手。吴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拉小提琴。他教我们政治,初三有政治课的。每天课前三分钟“小预备”,他必定准时站在教室门口。只要他那认真、严肃的面孔一出现在教室门口,整个教室立马变得鸦雀无声。尽管那时候因大环境的缘故,读书积极性普遍不高,但他还是教得很认真。他上课时从来不讲废话,讲解条分缕析,让人一听就懂。天热时,他常常衣衫湿透,汗流满面,有时把眼睛都给迷住了,但他顾不得擦一下,好像在和时间赛跑似的。我们初三一年学得特别认真,只可惜那时读高中的名额是分配的,由各大队推荐,且只能推荐一个,这样绝大多数同学只好读到



编织梦想的人

■郑凌红

职业只是名片
你从未曾——稀释浓淡
四季,唱着复调的歌
赠予他人
也留给自己
黄昏是无声的
诗章

夕阳西下,还有月光
有些思绪在九月
相互约定
破冰而出
生命的丰盈
讲台,内外
天地鸣珮
灵魂——织锦

亲爱的人们

■婀娜红

不知不觉,又到了教师节。前阵子,趁下乡工作走访空隙,去了一所乡下小学,朋友在那里当校长,履新不久。饭后,打他电话,说去看他。车子刚拐进校园,他已经站在那迎接了。我一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我也知道,以他的性格,处事谦恭,注重细节,一如当年那个少年。只不过,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各自忙于日常琐碎事务,交流甚少。

彼时,他在忙着排课,整理材料。午后的会议室内,除了我和他,还有两位女教师在低头制作表格。青春的脸庞,专注的眼神,让我想起自己刚工作那时也有的干劲。我还注意到,在她们的身后有一些快餐盒,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想,她们对新的学期可能有一丝小紧张,却形成了我眼中一帧素简而温馨的画面。

这些年,这位朋友在乡下的学校辗转,从一名普通教师起步,历经多个岗位的磨炼与沉淀,如今已成长为行业公认的教学标兵,其间的辛苦和付出可想而知。但我知道,他不高的个子,却干了很多让人高看一眼的事。他的低调内敛,让我每次跟他见面时都产生一种敬意。他对学生的关心,也陆续继续从旁人的口中传来。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想,老师们的生活和工作,应该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既有欢笑也有酸楚,主色调自然也是如水般平淡。回忆如河水漫涨,想起如烟往事,那些笔记本如同射出去的箭、沉到海底的船,再也回不来了。

笔记本是读初中时的记录,那是真正的笔记本,不是现在所理解的笔记本电脑。那些年里,我和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先用圆珠笔或铅笔在课本的顶端、底部、侧边的空白处,趁着上课自以为听懂了的时候,偷偷记下各科任课老师的“名言”。老师们当然浑然不知,还以为我记得很认真。的确,那些刹那间从老师嘴里吐出的言语,闪着智慧之光、哲学之光、幽默之光,给了我像花儿一样的快乐之感。我虔诚地在课后花了较多时间誊抄到笔记本上,以便在夜深人静之际回味,或者在寝室里吐露,成为大家睡前的幽默调料。

记得班上有一位数学老师,教学水平很高。作为冷幽默的老师代表,他在我们班里成了课堂上不经意就炸开的开心果。比如说,谁上课开了小差,他慢悠悠地在一排排课桌间踱步,趁着大家不注意,在昏昏欲睡之人的桌上猛地“笃笃笃”敲几下,惹得那人触电般地一震。敲完之后,那位老师脸上依然平静,你看不出他脸上的任何波澜,包括微表情。于是,全班的笑声就很自然地 from 蒙着的鼓里弹出来,一发不可收。老师说,“敲多了,你们就清醒了”,的确,读书和做人一样,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时光一晃而过,那位老师至今没有再见过面,但我记得,留在记忆里也很好,当然祝福每年都会如期而至。于我而言,那时的时光,没有遗忘已是不易,不必刻意去按下返回键。

一路走来,教师这个职业似乎和我的缘分黏合度很高。周边的朋友里面,从事教师职业的占比最多。每年教师节到来,于我而言,并非需要一种仪式感,但仍会情不自禁想写点什么,留下点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曾受到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影响了我们。作为生命历程中的某种提醒和回想,依然有它更长远的意义。

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路,我们迎向每一缕阳光,沉默于每一片叶落。红尘来去,沿途风景万千,老师是一味良药、一面镜子、一把折扇,宛若打开《镜花缘》中的千面国,摇曳多姿。

访杨文学老师

■黄竞浩

屈指数来,我和杨老师认识已经整整60年了。1965年9月新学期开学,嘉善县惠民中学初二班的我们迎来了新的语文老师——杨文学老师。他不高的身材,说话文质彬彬,举止温文尔雅,一上课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然而,杨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文革”开始了,书是读不成了,接着又是上山下乡,到1976年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杨老师已经调走了,我和杨老师有近50年未谋面。

1998年6月,大通中学与惠民中学合并重组,命名为嘉善县第五中学。历经近40个春秋的母校惠民中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于这所我读过书又工作过16年的学校,我是很有感情的,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不应被淹没。于是,我想写点什么,就想到了杨老师。

今年5月的一天,我几经辗转,找到了杨老师的住处,见到了这位我几十年前的老师。年近九十的他,还是那个样子,虽好像矮小了些,但仍精神矍铄,说话也还是那样慢条斯理,只是一只眼睛眼皮塌陷。见到这情形,往事不禁又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读初二时,教我们体育的是来自上海的朱老师,擅长踢足球。当时学校场地小,乡镇学校的体育课都不教踢足球,而我们学校比较特别,隔三岔五在体育课上踢足球,我们喜欢踢,朱老师也经常和我们一起踢。杨老师当时年纪轻,也喜欢运动,看见我们踢足球踢得兴高采烈,他也加入了“战队”。不料在一次踢球中,飞速袭来的足球击中了他的面门,有一只眼睛一下子就出血了。据杨老师说,之后到处求医问药,总是看不好,慢慢地,这只眼睛就萎缩了,看不见

东西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写毛笔字。当时,杨老师除了教我们语文课外,每天下午上课前的15分钟写字课也是他负责的。记得每次上写字课,他总是拿着一块小黑板进教室,小黑板上用红漆画着醒目的九宫格。他把小黑板挂在大黑板上,拿出准备好的浓浓的石灰水,用大号毛笔蘸着石灰水在小黑板上演示,黑白分明,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写的一笔一画都端端正正的楷书,让我们在大楷本上照着写。可以说,我后来喜欢书法,就是因为杨老师的启蒙。

思绪拉回到了眼前,我们聊起了初创时期的惠民中学。惠民中学创建于1959年,其时嘉善并入嘉兴,故名为“嘉兴十九中学”。1961年恢复嘉善县建制,学校更名为“嘉善县惠民中学”。杨老师于1961年8月在当时的嘉兴师范学院毕业,和其他三位老师一起被分配到惠民中学工作。当时,学校规模极小,一个“工字型”的校舍,6间教室加3间小房间,一个初一班级、两个初二班级。学生来自惠民、大通、大云三个公社。学校的领导、会计及后勤都是中学、小学合在一起的。由于学校校舍紧张,杨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就住在小学里。

杨老师说,由于学校教师少,当时他除了教初二语文课和历史课外,还负责学校教学管理工作,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少先队总辅导员。

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1962年,农村普遍缺粮。农村的粮食政策也随之改变,由按人口分粮改为按劳动工分分粮,因此,学校出现了大规模“流生”现象。为了动员学生返校,杨老

师和其他老师在上课之余,分头到各个大队的学生家里家访,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有的学生家里去了多次,甚至给学生饭票。近一个月起早摸黑的家访,收效甚微,初一一班只剩30多名学生,两个初二班并成了一个班,也只有40人。学生大幅度减少不说,校长、教师也有多人被调出,最后只剩下杨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惠民中学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面临着被撤掉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杨老师为学生着想,为农村教育着想,给嘉兴专署文教办去信,反映现状,陈述理由,希望保留学校。半个月后,县政府领导、公社党委书记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当场决定:学校不予撤销。几天后,县里派来一位校长,此后,惠民中学又逐渐发展起来。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杨老师说起这些往事来,还是清晰、明了,当时学校里其他教师的名字、调进调出的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家访过的学生姓名也记得几乎一字不差。在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惠民中学为惠民、大通、大云三个公社培养了不少学生,这里面有着杨老师不可忽视的功劳。

临别时,杨老师坚持要送我。一路上又聊了许多,直至小区门口,我们才依依惜别。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由于家有老母需要照顾,杨老师去了家乡的学校——干窑中学,后又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了嘉善技校,最终在嘉善中专退休。勤恳的工作态度,平和的心态,使杨老师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作为学生,我真心祝愿老师身体健康、晚年幸福!